

这个监区有“艾”亦有爱

□记者 徐荔

“有不止一个刚被查出艾滋病的服刑人员，走到楼下就不肯再往上走了，他们知道楼上就是专管监区，觉得来了就没希望了。”汤慧杰是上海市新收犯监狱艾滋病专管监区的副监区长，自2011年从事艾滋病犯管教工作至今，见过几百名或绝望或迷茫或自卑的艾滋病犯，“无论他们经历过什么，在这里，我们都不抛弃、不放弃、不歧视，努力帮他们拓展生命的宽度，重拾生活的梦想。”

2005年开始收押艾滋病犯，2012年挂牌成立“胡水清工作室”，2016年成立艾滋病专管监区……18年来，上海市新收犯监狱收押过900余名艾滋病犯，全力延续着艾滋病犯在狱内“零传染、零事故、零死亡”的成绩。

今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前夕，记者走进新收犯监狱，看看全市唯一收押男性艾滋病犯的专管监区又有什么新故事？

自己终于面对现实 但如何让父母接受真相？

如果不是因为吸毒，阿景（化名）不会和自己的伴侣走上以贩养吸的道路，不会被判十二年有期徒刑，也不会服刑人员新收体检中被查出艾滋病。

“人是麻的，脑子一片空白。”时至今日，阿景仍对七年前的情况记忆犹新。因为对艾滋病认知有限，阿景和大多数人一样，觉得得了“世纪绝症”就活不久了。而阿景当时的CD4指标（CD4是确定艾滋病病毒感染患者免疫系统是否受到损害的重要指标，一般情况下，CD4正常值为每立方毫米500-1600个）太低，根据监狱相关工作规定，阿景被送往监狱总医院接受治疗。在约两年的医院治疗中，阿景才终于渐渐接受现实。

“在医院了解了很多有关艾滋病的知识，知道坚持吃药治疗还是能活下去的。而且，自暴自弃也不是办法。”眼前的阿景笑着说。其实，如果不是提前知道阿景的情况，他看上去与常人无异，除了领口处露出的皮肤上有些红疹。

2019年，阿景回到新收犯监狱专管监区。回去前，他曾生出一丝忧虑不安，但在见到监区民警后都烟消云散了。在他们眼神里，阿景没有看到歧视；从他们的动作里，阿景没有感受到隔阂。甚至在感冒发烧脆弱时，阿景感受到了民警的温暖关怀。

就这样，阿景较快地适应了服刑生活。

阿景的日常作息与普通服刑人员大致相同，不过是多了每日定点服药、学习了解艾滋病治疗最新动向、一年两次体检等与自身健康息息相关的“任务”。

可是，阿景的父母至今还不知道他有艾滋病的事。远在东北的他们这些年和阿景聊得最多是未来生活的各种可能性。今年5月，阿景的父母来监狱参加了亲情会见。看到父母明显苍老了很多的样子，阿景更纠结了：“我犯罪已经让他们够伤心了，还要让他们接受我感染艾滋的现实，太残酷了。”

余刑还有三年不到，阿景觉得出去后最重要的事就是照顾好父母，弥补这些年的亏欠。但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必然要做好防护，吃药治疗的事也瞒不久，该怎么让家人知晓真相、接受现实？

阿景也清楚地知道，社会上大多数人不会像这里的民警一样把他当普通人对待，刑释人员的标签已经让人望而生畏，何况还有艾滋病。自己出去后能否顺利融入社会，重新开始正常生活？

“一想这些事就头疼。”阿景无奈地扶额……



专管监区组织服刑人员参与制作钻石画

新收犯监狱 供图

不再走上歧路 让“‘艾’到我为止”

阿景遇到的问题正是目前专管监区民警在思考和探索的。

“我们要做的不只是把罪犯教育转化为合格的服刑人员，还要把他们打造成合格的社会人。”汤慧杰告诉记者，这些年，专管监区全力延续着艾滋病犯在狱内“零传染、零事故、零死亡”的成绩，也认真探索艾滋病犯抗病毒治疗方法，与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但，这样还不够。今年，专管监区探索实施“知、信、行”改造模式。

根据介绍，服刑人员到专管监区后，首先要接受的就是对艾滋病知识的学习。“有不少罪犯是在得知自己感染艾滋病后，以为命不久矣，为了最后捞一笔而犯罪。”汤慧杰表示，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消除他们的恐惧心理，让他们积极服刑、配合治疗，也是教育矫治的需要。

接着，便是树立信心。专管监区通过组织服刑人员参加声乐、钻石画、书法班等艺术项目矫治以及太极拳、健身操等康复训练活动，让他们在艺术矫治中找到自我价值，在体育锻炼中找到康复信心。

至于“行”，则是“行稳致远”。民警对服刑人员开展责任感方面的教育，让他们学会行事保持冷静和清醒的头脑，不再走上歧路，让“‘艾’到我为止”。

但这也是最难的，汤慧杰介绍，由于亲属的怨恨心理以及社会大众“谈艾色变”的恐惧心理，艾滋病犯不被家庭和社会接纳的比例较高。

汤慧杰记得几年前，有个20多岁的小伙子，因涉毒犯罪被判七年，服刑期间小违纪不断。汤慧杰深入了解后得

知，小伙子是因为觉得家人不要他了，无所谓了。既然症结在家人，汤慧杰便想方设法和小伙子的家人联系，最后联系到了他的姐姐。

“又是犯罪，又是艾滋病，家人怎么会不恨不怨？”汤慧杰记得当时姐姐的态度很决绝，表示家人不指望他了。但是，汤慧杰一次次联系，讲小伙子的服刑情况、对家人关怀的渴望，也讲艾滋病的相关知识、治疗方式。也许是汤慧杰的坚持终于打动了家人，也许是了解艾滋病的知识后家人没有那么害怕了，姐姐开始写信、打电话，来监狱会见，后来还带父母一起来。汤慧杰也看着小伙子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破罐子破摔向积极服刑转变，后来还成了改造标兵。

对未来有希望，一切就会不一样。汤慧杰遇到过好几个类似的例子，也从他们的转变中看到了工作的价值：拯救了一个人，也挽救了一个家庭。

小伙子是幸运的，在服刑中就与家人修复关系，得到接纳。而那些没那么幸运的艾滋病犯呢？而且，专管监区民警发现，出监后的半年左右时间往往很关键，一旦刑释人员没能在此期间“回归”社会，就很有可能重新犯罪。

“这是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一项工作。”为此，专管监区民警主动出击，与上海市社会帮教志愿者协会寻求合作可能。经过双方协议，目前已有五名艾滋病犯与黄浦、浦东等区帮教协会的帮教志愿者结对，以解决刑释后的生活、就业等实际问题为导向开展帮教工作，更好地帮助服刑人员回归。此后，还会继续增加结对帮教的人数。

工作室交接 是责任和使命的传承

“目前，已经有一名服刑人员和帮

教志愿者达成共识和意向，未来会到区协会的“阳光之家”进行为期半年的过渡，后续工作我们也会跟进。”汤慧杰介绍，“在基本工作职能不变的情况下，再向外延伸、拓展，这也是‘胡水清工作室’新的工作定位。”

2012年挂牌的“胡水清工作室”是新收犯监狱一支以艾滋病犯管理、教育、转化为工作核心的专业研究团队。这些年来，为探索艾滋病犯改造工作规律，制定正确有效的工作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去年，“领头人”胡水清退休后，工作室的担子就移交到了汤慧杰身上。

“不仅是相关工作的交接，更是责任和使命的赓续传承。”以前在胡水清身上学到的东西，如今汤慧杰他们都要“传”给新加入专管监区的年轻人。

叶长久就是两年前才加入专管监区的“90后”。得知要到专管监区工作后，他慌过一阵，也没敢告诉父母。找人问过相关情况，也找书了解相关知识，可是他说：“就像学游泳一样，理论再多，还是得行动了才会有切实感受。”

初到专管监区的叶长久选择到监房走一走、摸一摸的方式克服心里的怵，“当时因为紧张，动作大概都是变形的。”叶长久有些自嘲。

“因为不了解，所以害怕，人之常情。”专管监区教导员宋耘轩和汤慧杰不约而同地表示。汤慧杰坦言，他刚接触艾滋病专管工作的时候很夸张，前一个月里每天要洗手三十多遍，也会有很多稀奇古怪的担心，比如“蚊子叮过艾滋病人再叮我，会传染吗？”

“当然是不会的，这要说到病毒载量等专业问题。”汤慧杰笑着解释，“充分了解相关知识后，就觉得自己的行为 and 疑问很幼稚可笑了。”

“所以我们会安排新加入团队的民警参加公卫中心老师的专业讲课，全面了解艾滋病的知识。”宋耘轩较多负责新加入团队的民警的培训工作，他介绍，资深民警也会言传身教规范的工作方式，让年轻人在学会保护自己的同时维持执法威严。

“更重要的是明确自己所承担的职责，有正确的执法理念。”宋耘轩表示，其实艾滋病犯更需要民警思考如何既有硬度，又有温度地管理，让他们心服口服地接受，矫治效果才能更长久。

现在的叶长久早就在润物细无声的环境中适应了专管监区的工作，家人也知晓并支持。他已和前辈们一样，是民警，也是医生、父母、朋友，和前辈们一起探索管教新模式，也用坚守证明这里有“艾”，亦有爱，守护一方日夜安宁。